



● 骆驼丛书

LUOTUO
CONG SHU

搬家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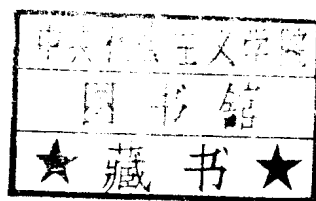
萧乾·著

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07858

搬家史

萧乾·著



搬 家 史

萧 乾 著

责任编辑：朱 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 0 6 8 邵阳印刷厂印刷

●

198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3.75 插页：3 字数：5800

印数：1—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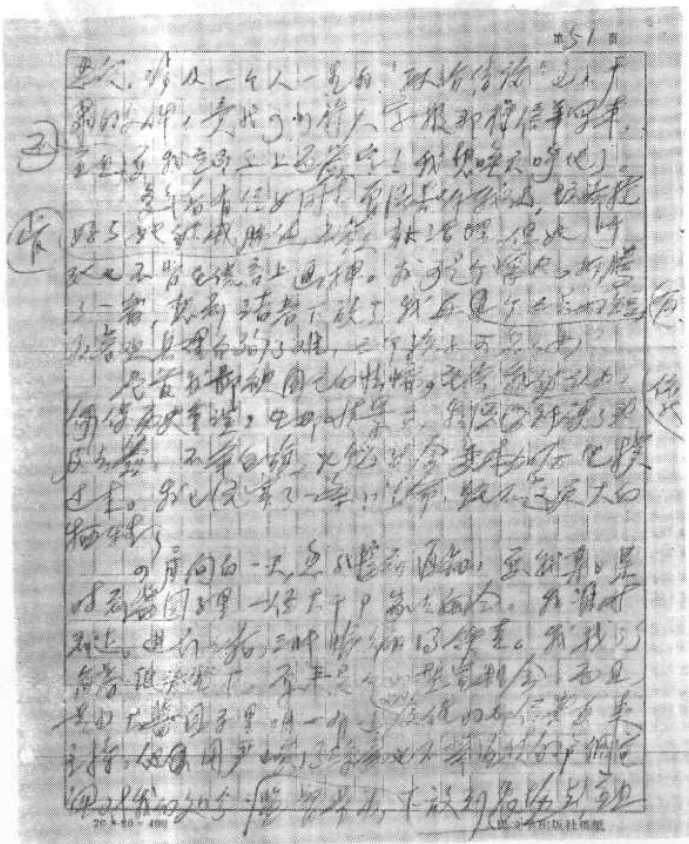
ISBN7—217—00134—x / I · 59

统一书号：10109·2117 定价0.88元

新书目：87—26



蕭乾



作者手迹

目 次

一	服水土.....	7
二	在大酱园子里.....	18
三	以场为家.....	37
四	避风港.....	72
五	又没家了.....	79
六	五七道路.....	94
七	终于又有了家.....	103

我生平没喂过鸽子，可从小就对鸽子——特别是信鸽——发生浓厚的兴趣。

我并没有什么可叫它们传递的，因此，使我感兴趣的倒不在它们那套神奇的本事。吸引我的，使我无限神往的，是它们对“家”的依恋——执拗的、什么山川都无从阻挡的依恋之情。

所谓“家”，左不过是稻草铺成的小小的窝吧。窝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只有几只咕咕咕叫着的雏鸽。然而那个窝以及窝里的小生命却占据了它们的全部心灵。

鸽子不会象传递鸡毛信的红小鬼那样意识绑在它们腿上的纸条对军事或民用的重要性。它们脑子里只有一根弦：不论路有多么遥远，多么崎岖和险阻，反正它们得回家。家就是它们的指南针。

养信鸽的人，利用的也正是它们那股恋家的执拗劲儿。

想想看，从上海到洛阳，或者从武汉到北京，得飞越多少江河湖泊、崇山峻岭和广漠无际的平原啊！一路上，晴天得挨烈日曝晒，遇上暴风雨还得经受疾雷霍闪的折磨。必然会有个别信鸽归途不幸给雷击中，栽到林间山谷里丧生的，然而那改变不了它们的本能——它们那种“我要回家”的强烈意志。

不象苍鹰，鸽子并不以貌惊人。尺把长的身躯，圆圆的小眼睛，那咕——咕——咕得儿咕的叫声单调而且平淡。然而在那小身子儿里装着怎样的坚毅和果敢啊！它们的生活目标无比单纯：就是要回家。它们为之全力以赴。

若干年前，一次春耕劳动中，我一锹下去刨出个老鼠窝。不论是四害还是五害，老鼠当然都跑不掉；它们偷吃谷物，十恶不赦。对于自然界的敌人，我向来没手软过。惟独刨出那个鼠窝之后，我并没举起锹把，立刻将它拍个粉碎。我被窝里井井有条的布置吸引住了。

土壤同旁处一样，也是黄中带黑，可没想到离地不到一米还有这么个“家”！细心的老鼠把窝分成几格，就象儿童玩“过家家”的那种雏形小房间。偷来的谷物并不乱堆，玉米呀，豆子呀，都分开放，而且好象还有间“婴儿室”。（这时，大老鼠要么闻声吓跑了，要么外出打食去了。）称它作“婴儿室”，是因为里边蜷卧着七八只初生的幼鼠：浑身光润，呈淡粉色，每只长仅寸许。我摆开锹把，蹲下来，忘情地端详着。心下不禁赞叹起老鼠的治家之道了。

家，象是生命的定心铈。也不知“安居乐业”最早见于什么典籍，这四个字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生活中的一个因果关系。世上也许有流亡者写出

过了不起的作品，可我漂流在外的那七年，没写出什么象样的东西。不论徜徉在苏格兰的雷梦湖畔，还是眺望罩着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我的心情都轻松不起来。俗话说相思使人消瘦，乡愁的滋味也苦不堪言哩。外在的景物越美，心里越是沉重，仿佛陷下个空洞，或有一只刺猬在里边滚爬。人家一过节，不管是圣诞还是复活，晶莹的彩色灯泡在枞树枝上闪亮着，个个穿起盛装跳舞，我却只能游离在那片欢乐气氛之外。对于游子，那不啻是火上浇油，越发勾起乡愁。

四八至四九年间，我就是一只漂泊在外的鸽子，面临着重新飞向远方，回到那旅居过七年之久的异邦，继续过那种游荡生涯呢，还是回老家北平的选择。不同于三九年那次，剑桥提供的待遇确是优厚的。然而当时，我的青年时期已告结束，正在迈入中年。正如我在《往事三瞥》的第三瞥中所坦率承认的，对于回北平，我曾有着多种顾虑，有些后来证明也并非杞忧。但我还是象只恋家的鸽子那样，一心奔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北平。

其实，我可以说是从小就没有过家。母亲早逝后，就搬进了学校宿舍，十四岁上又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环境。北京城就是我的家。在大轰炸中的伦敦，即便躺在地铁站台上过夜，我的心也驰向

那座被护城河和垂杨柳围着的古城。八五年年底，我还在几篇《杂忆》里宣泄了自己对它的依恋。正如我在《梦之谷》中所描写的，一九二八年我在汕头买到几只“北京”彩蛋（松花），就曾把上面沾满稻壳的泥巴抠下来，供在书桌上，以慰乡思。那阵子我常在梦中亲吻北平的城墙。在汕头，我改名“一燕”、“若萍”，总是忘不了自己的游子身分。当时倘若真和那位潮州姑娘去了南洋，我估计也呆不长。我的心好象早已深深地埋在北平的城角下了。所以不管我有多少顾虑，怎么犹豫，最后的抉择是注定了的。我要回到北平去，在那里，我要第一次筑起自己的家，一个稳定可靠的家，并力所能及地做点有益的工作。

我就是在这种本能的——是本能，而不是认识或觉悟——驱使下，谢绝了剑桥的邀请，做出终老于北平的决定。

这样，四九年八月，我随了朋友们搭华安轮，从香港经胶东来到了北平。

一踏上东车站的站台，我就长叹了一口气：可回来啦。

现今，东车站早已作废，改为铁路工人俱乐部了。这座位于前门箭楼东侧的车站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充当过重要的舞台。当年冠盖往来，车水马龙。它也是我个人经历上的一座里程碑。二八

年十二月，我从这里去的潮汕，三五年七月，我又从这里搭车去的天津大公报。如今，又是从这里，我走上革命的岗位。

我的动机（为了安居）也许很不纯。对每个人来说，“解放”的意义都不尽相同。人到了三十九岁就不怎么喜欢漂泊下去了。我想，该打倒的，打倒了。今后，就跟在革命大旗后面，同大家一道，重整家园吧。

现在才认识到四九年的我，有多么无知，把“安家”想得多么轻而易举！折腾来折腾去，经过种种难以逆料的风浪波折，三十四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三年，我才混上个可以安心放胆住下去的家，一个估计不至于再迁移的家。

搬进这个地方后，由于它刚好同马路对面的两座高知楼遥遥相望，竟然还有朋友替我不知足起来，嫌我这儿没澡盆，没地板，没坐桶。其实，最初曾给我三处来挑。另外两处我连看也没去看。我说，中了，而且这回永远也不再搬了。因为我知道，还有多少三代人住一间斗室的，多少家还在睡着双层床，很多中国人还在排队上着公厕，我还有心肠去挑挑捡捡！

搬家那天，我慨叹说：人生几何，哪能把那么多时间精力全花在搬家——特别是为搬家而舍脸舍命去奔走上！

倘若我还没有这么个窝，或者有了而仍不满足，还想更上一层楼，那我就不会写此文了。那样岂不别有图谋了吗？为了避嫌，我也得躲着这个题目。

当前，正是由于已打定主意老于斯死于斯了，我才来写此文。我个人搬来搬去本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费笔墨。然而个人经历中往往反映着社会的演变。正因为如此，野史才是正史的补充。说不定我的搬家史也能从侧面反映一下近三十几年来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变迁。

七八年重新拿笔后，限于个人条件，我很自然地写起回忆录来了。开始，大都采取“代序”的方式，后来又通过歌声呀鼓声呀一些琐事，把自己的一生串起来。这回是想在“搬家”这个题目下，回顾一下四九至八三年这段难忘的岁月。

信鸽在归途中，也不免遇到风雨甚至闪电；然而一旦飞回故巢，就安顿下来了。我这只归鸽在飞回来之后，却又搬动了十几回，不少次搬动都和个人的政治命运分不开，而个人的命运又同时代是息息相通的。

一 服水土

四九年之前，我从没在镰刀斧锤旗帜下生活过。在伦敦，我参加过英共的集会。柏林解放后，到过苏联红军占领区。然而在红色政权下将怎样生活，我没底。从四九年在青岛上岸那天起，我就怀着一种激动和好奇，不时地用现实和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对照着，比较着。

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少年时期，我读过不少小册子，内容大多是反帝的：抨击强国欺凌弱国，揭露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实行的炮舰政策。那些，在我心坎上激起了义愤。从那时直到三九年，共产主义在我心目中就是合理社会的代名词。在那个理想国里，一切可憎的东西都被清除得荡然无存，人和人是平等的。

每当我唱起：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

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

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

时，我的胸脯就挺了起来。三十年代我虽不再梦想当职业革命家了，对于革命，对于苏联，对于共产主义，却仍是向往的。

三九年，偏偏在苏德协定之后，我去了浓重地弥漫着反苏气氛的英国。那里，三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尤其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左倾的。奥登、斯宾德尔、依修伍德，甚至奥尔沃，不论是贵族世家还是官僚地主出身的，都站到左边来了。三六年，小说家 E·M·福斯特在巴黎举行的欧洲作家代表大会上曾慷慨激昂地说：倘若我再年轻一些，我一定加入共产党。然而莫斯科的肃反扩大化，继之以那个协定之后，他们就象操场上演习着的士兵那样，一下子全向右转了。

当时英国很多老百姓都把战争带来的不幸，一古脑儿写到苏联的账上了。报纸、书刊以及广播和电影，不约而同地将共产主义涂得阴森可怕。五六年苏共二十次大会透露出的那些恐怖，西方各国早在三十年代就添油加醋地宣扬着了。对于苏共的党内斗争，不管多么残酷，我兴趣不大。

但是对那里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是关心的。战后，我也特别留意东欧的情况，尤其非党知识分子在红色政权下的遭遇。

由于上述这些阴影，初到解放后的北平，我才那样观望。

我们几个一道从香港来的伙伴，下火车后就住进了前门外西河沿亚洲饭店。这是我重返古城后，第一个落脚点。这里已住了不少比我们先从香港来的民主人士。当时就有人从自己住进的招待所，推敲起各人的等级行情了。最高一级看来是北京饭店，其次是翠明庄。个别人竟为此而大发牢骚。我倒没有，也不认为那就代表级别。编辑人员虽然到了北平，刊物却继续在香港出着。于是，我们刚一卸下行李，就挽起袖子干了起来。

亚洲饭店不大，可也得开两种灶。我多么想和一道从香港来的年轻党员同桌而食啊。可是不成。他们安排我坐到小灶席上，自己却到大灶上去啃窝头。这件事使我心里老大的不安，同时，又从这个差别中觉出一种精神：共产党人先人后己，礼贤下士，感到自己在受到重视。

前门大街依然熙熙攘攘，什么冥衣铺香蜡店都照常营业。亚洲饭店紧邻正是妓馆集中的红灯区八大胡同，那里竟然也没关门。教堂钟声还在响，寺庙也仍然香烟缭绕。

我不解了，革命照理要大拆大卸，怎么这样原封不动！一位明白人指点我说：放心，会变的。一切都会变的。咱们毛主席最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向来稳扎稳打，绝不冒失。红色江山就是靠这本事拿下来的。

现在听说已拥有数千名中外工作人员的外文局，它的前身那时只有我们七员大将，其中领头的还只抽得出四分之一的时问。每天早晨我们这几个从香港来的就从西河沿一道骑车，到南河沿一个小四合院去办公，夜晚回到亚洲饭店睡觉。星期天的文娱活动不是坐在一起齐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叉着腰扭扭秧歌。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融洽。非党的常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

我开始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三十年代苏联那血淋淋的教训以及东欧的党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起了前车之鉴的作用，说不定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东方哲学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学《毛选》读到新民主主义要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心里感到踏实。我们这一代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个过渡阶段，适应起来也许就不吃力了。

不久，我们搬到一个叫银丝沟的地方。这是

一条与东长安街仅隔着一道朱墙的窄巷，门前一条小溪，水大概是从金水桥下流过来的。是一幢小楼，我住在楼上。

开国后，机构正规化了。我们这个由香港迁来的刊物隶属于新闻总署下面的国际新闻局，在新华社的大院子里办公。那是国会街的口字楼，系民国初年议会所在地。那原是个肮脏不堪的地方：什么曹錕贿选，袁世凯梦想登基当洪宪皇帝，是个曾表演过种种阴谋诡计的舞台。如今，却成为新中国对内对外的宣传中心。

这时，宿舍也由银丝沟迁到石驸马大街了。那是一座三进深的住宅，民国初年兴许曾是什么总理的官邸。大概是为了照顾工作，安排我住在尽后边的一个小院里，十分幽静。

八大胡同不是纹丝未动吗？一个下午，几十辆卡车出动，红灯区被包围起来。各等级的妓女、老鸨、茶房、伙计以至正在寻欢作乐的嫖客，一古脑儿被赶上了车。

多痛快呀！比邮局检信或废品站分类还麻利。没几天，上了卡车的人全按照不同的情况各就各位了。妓女们上了学习班，老鸨中间罪行严重的，进了牢房。

采访妓女改造的过程，对我是一次难忘的启迪。它使我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以及革命就是解